

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下布朗族的生态文化走向

——以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为例

杜香玉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是布朗族世代居住的古老村寨,经过历史的变迁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生态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布朗族的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人口增长与资源的矛盾、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宗教信仰的冲突等使得布朗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建设等发生了转变。布朗族生态文化需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寻求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文化发展模式,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布朗族;勐海章朗村;生态文化;民间信仰;文化转型;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032-09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07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Trend of the Blang People under the Colli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aking Zhanglang Village of Menghai County in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DU Xiangyu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The special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has been formed with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ancient Zhanglang villages of Menghai County in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collision of modernity, the folk beliefs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Blang People are facing great crisis and challenges. The Blang living modes, values and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are chang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sources and revolution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s.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Blang ecological culture will be explored to adapt to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us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the Blang People; Zhanglang Village in Menghai County; ecological culture; folk belief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historical changes

布朗族生态文化是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关于布朗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其内容涉及历史源流、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婚丧习俗等,集中于

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中的生态文化研究。穆文春、杨毓骧等人搜集到大量关于布朗族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传说故事和仪式等资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生态文化知识,但资料的使用缺少一定的考辨分析。^[1]吴兆录、丰爱两位学者从生态学视角对布

收稿日期:2017-07-15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杨林教授主持“云岭学者”项目中期研究成果(201512018);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中期科研成果(KS161005)。

作者简介:杜香玉(1992—),女,河北衡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环境史、边疆灾害史、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朗族龙山及坟山森林进行了研究,穆文春从布朗族的森林观及森林农耕方式出发,阐释了布朗族在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此外,杨竹芬、苏红斌的研究认为布朗族的生计方式之中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意识。^[3]安静认为布朗族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形成了布朗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4]近年来,布朗族的生活方式、生态观、森林观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其探讨较少涉及布朗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以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作为田野调查点,通过整理、分析文献资料及访谈记录,围绕布朗族在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中所包含的生态文化内容,探讨章朗村布朗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因素的冲击下面临的危机及应对措施。

一、西双版纳章朗村布朗族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章朗村是一个纯布朗族村寨,“章朗”是傣语地名,意为“冻僵了的大象”。从章朗村的历史进程来看,存在已有1487年之久。传说,古时候商贩从泰国用大象驮经书路过此寨,大象冻僵在此,故有此称呼;也有说法称,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有两位僧人,一位叫牙南坎皮,一位叫马哈洪,两位前往斯里兰卡取经,僧人玛哈烘传教至此,动员两个寨子合并形成章朗村寨,他们从斯里兰卡用大象驮回许多经书,大象行至此处冻僵之后,又有曼样布朗族从布朗山迁居到此,人口逐渐增多。^①章朗村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之中,经历了不断迁徙、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形成现今格局,是一个典型的集生态、文化、风俗、宗教、礼仪于一体的布朗族村寨。

(一) 自然环境

章朗村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定乡,全村国土面积5.47 km²,海拔1330 m,年平均气温21.50℃,年降水量1530.00 mm。^②章朗村森林的分布区域海拔超过1300 m,已超出热带气候范围,属于南亚热带气候,全年无霜,分干湿两季,适宜植被生长,珍稀植物较多。

从植被分布来看,村寨周围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分为水源林、风景林、经济林,属于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以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以及山地矮林四种植被类型^③为主。由于章朗村寨自然生境保护良好,其植被种类丰富多样,对于反映西双版纳西部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区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种子植物629种,占西双版纳种子植物区系(3856种)的16.3%。热带山地雨林主要分布于水热条件较好的沟谷地带,自章朗总佛寺以下沿河谷两岸至海拔1300 m左右均有热带山地雨林分布,其保存较好的是“坟山”,代表植物有高榕、蒲桃、云南臀果木、绒毛番龙眼、西亚梭罗等。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章朗总佛寺以上的区域,下部过渡到山地雨林,上部至山顶演变为山顶矮林,以樟科、茶科、壳斗植物为优势类群,代表植物有:普洱茶、红木荷、茶梨等,此类植物中林下蕨类植物十分丰富(见图1)。由于章朗村位于森林之中,气候适宜大多是兰科植物,尤其是附生兰类植物生长繁殖,有些则是重要栽培和资源植物,如百合科、蔷薇科、姜科、爵床科、茄科等^④。从动物分布来看,并未有专门调查数据进行详细统计。但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当地村民的口述可知,历史时期此处森林密布,动物极多,是众多虎豹鹿熊生存之地,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为维护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

①资料来源: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院于2016年所编《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西定乡章朗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第7页。

②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2016年5月4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1页。

③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2016年5月4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5页。

④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2016年5月4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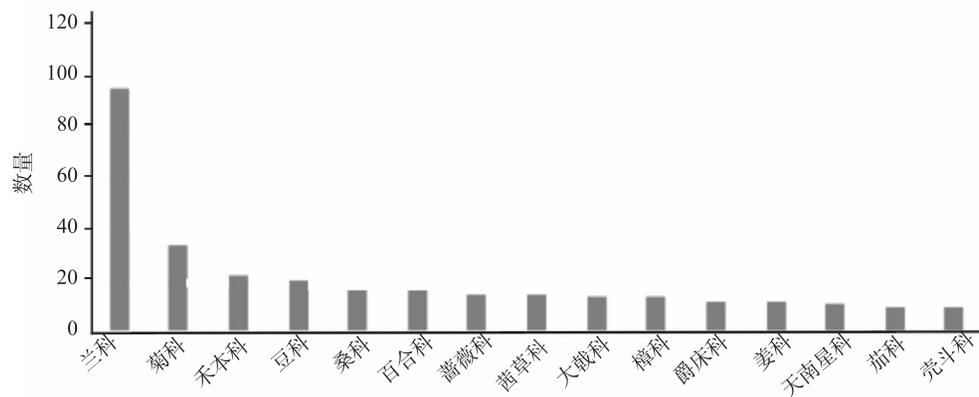


图1 章朗村种子植物区系

(二) 社会环境

从当前人口与经济情况来看,章朗村现有耕地 3 857.00 亩(257.13 hm^2),其中人均耕地 3.42 亩(0.228 hm^2);林地 4 500.00 亩(300 hm^2),其中经济林果地 3 548.00 亩(236.53 hm^2),适宜种植水稻、甘蔗、茶等作物。全村辖 3 个村民小组,即老寨、中寨、新寨,2014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565.0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 759.00 万元^①。据村支书所讲,截止到 2016 年,章朗村有农户 265 户,人口 1 123 人,男 545 人,女 578 人,其中农业人口 1 123 人,劳动力 721 人,从事第一产业共 690 人,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从民族成分来看,章朗村以布朗族为主,但也有嫁入村寨或外来居住的人员,他们一般为汉族,因布朗族的祖先与傣族、哈尼族有纷争,所以规定不能与两族通婚。

章朗村周围的原始森林生长着许多野生茶树,古茶业成该村的主要特色产业。关于古茶树的发现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据大阿章口述:很久以前,布朗王的儿子突发重病,四处求医无果。有一次,布朗王外出征战,他的儿子在林中散步时,天上飘下一片绿色的叶子掉进他的口中,之后,布朗王儿子的病竟然好了,这片神奇的叶子便是茶树叶;另一个版本是说,布朗王在去世时,他觉得留下金山、银山,子孙们都会用尽,而茶树可以为子孙带来无尽的财富,于是,茶树便被布朗族世代种植。这两个传说以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布朗族的祖先受益于茶树,茶树是他

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章朗村原有的古茶树面积为 700 亩(46.66 hm^2),在此基础上,章朗村民又扩大了乔木茶、台地茶(又称生态茶^②)的种植。自 2004 年开始,随着章朗村普洱茶逐渐市场化,一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陆续回乡,投身于家乡茶业,使得村民的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也加速了村寨的经济发展进程。

综上,气候适宜、植被丰富的章朗村由于交通不便、地域封闭阻隔了布朗族与外界的交流,形成适宜本民族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闭塞使其民族文化较好地保留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章朗村的农耕方式仍为“刀耕火种”,生产工具仍以竹木器、铁制农具为主,传统文化未受到外界影响,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外流,促进了章朗村与外界的交流,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转变,现代化元素逐渐渗入,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正在发生着转变,布朗族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

二、传承与延伸: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生态文化发端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之中,并不存在脱离人类的生态文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生态文化是在旧有经济模式、制度模式、思维模式中存在的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文化形态;从现代意义而言,相对于旧有模式下,生态文化具有科学性、选择性、创新性。

^①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 2016 年 5 月 4 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 1 页。

^②生态茶即不施农药,其肥料完全来源于腐烂的树叶。

学界对于生态文化概念的阐释尚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生态文化是区别于人类过度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传统文化中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态文化是人类文明演进中传承下来的历史性积累和经验。^[5]一些学者对于生态文化的定义和内容进行了界定,^①但由于出发角度不同,不同层面对于生态文化的理解各异,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足之处。笔者认为,生态文化建基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之上,是一个形象的、直观的、动态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有所延伸和深化,并非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而是在嬗变之中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形成的带有传承性、发展性、创新性特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现代概念,传统文化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从生态文化的定义和内容来看,传统与现代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具有共融性,只有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度”,两者才能契合。纯粹的传统,会使人类发展停滞不前,而单一的现代化趋势,则会使人类丧失文明。布朗族生态文化在传承、延伸之中,其传统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受到不同驱动机制的影响,需要不断深化和创新,以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布朗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世代依山而居。在布朗族眼中,山林是自然的一种赐予和恩惠,其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完全依托于森林,于是造就了布朗族与自然相处的一种独特的生态文化。布朗族的生态文化经历了长期的演进,为适应其生存环境,形成了一种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意识形态,强调在人与自然共生模式下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方面。

(一) 生产生活领域中的生态文化

人与自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们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人们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需要,寻求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布朗族的文明演变历程有别于中国传统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布朗族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经济形态,采集、渔猎与农耕等生产方式交错进行,山林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1. 尊重自然:依时令而采猎

章朗村所属山区为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周围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野生植物资源丰富,为村寨村民提供了良好的采集场所。章朗村周边森林之中可采集的食用类野生植物种类多达数十种,如芭蕉花、野荠菜、蕨菜、野芹菜、菌类、竹笋等;狩猎一般不分时节,由于布朗族依托山林而生,长期积累的狩猎经验摸索出动物的习性,并采用多种方式捕获野兽、鸟类、鱼类,^[6]⁵⁶章朗村寨附近的森林之中栖息着多种飞禽走兽,如虎、熊、豹、野猪、野牛、蟒蛇等,山谷地带的小河流中也有一些鱼类可捕食。

布朗族的采集任务一般由妇女承担,每逢春、秋两季植物生长旺盛,妇女结伴前往山林采集各种可食用的野菜、野薯、竹笋和菌类植物。历史时期的布朗族便是以游猎为主,主要有个人狩猎和集体狩猎两种形式,狩猎工具有火枪、弓箭、长刀、弩等,狩猎方法有围猎、设计陷阱、设地弩、火攻、隐蔽待猎、追

^①从生态文化的定义,任永堂认为生态文化即人类社会的文化,从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来看,大体经历了自然中心主义的原始文化、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三个阶段,生态文化是认为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人类文化发展所追求的最佳模式。杨红的《摩梭人生态文化研究》一文认为生态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静态的概念和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各不相同、各具特色,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民族生态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从生态文化的内容出发,余谋昌所撰的《生态文化论》一书认为生态物质文化是指人们为适应其生存环境而不断地转变生产方式、能源方式、生活方式,以实现生态保护;生态制度文化是指环境问题进入社会规范和秩序,人们为保护环境而逐渐形成制度,环境保护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调整,并寻求新的社会制度;生态精神文化是指人类认知自然的方式,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环境宣传与教育等。廖国强的《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一文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为指导,以调适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精神)文化的总和。

击等多种方式,对于虎、熊、野猪等大型动物一般是设计陷阱,等待捕获;如山鸡、松鼠等小动物,则是采取诱捕,而小鸟等则是用弓箭、火枪等。^[7]章朗村布朗族关于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有很多生动的传说,一方面,布朗族既害怕毁坏森林会带来灾难,又不得不砍伐森林建筑房屋;另一方面,既畏惧一些凶猛的动物,又不得不捕获动物来获取食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充分体现,章朗村布朗族将动植物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反映了章朗村布朗族的生态观念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互动。

2. 合理利用自然:据地势而耕

章朗村布朗族位于巴达山山区,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迟缓。村寨长期从事山地农业,农耕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轮歇抛荒”,长期的休耕轮作既维持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土壤肥力,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前,章朗村寨的农作物种植以旱稻、玉米为主,辅以小麦、荞麦、瓜豆等,旱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山地农耕作业中有一套完整的耕作流程(见表1),整个过程中较好的遵循了自然规律。

表1 布朗族旱稻生态生产流程

过程	时间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选地	阳历一月	一般选择抛荒多年旧地(保护林地)
砍树	阳历二月	一般不砍小树、老树(保护树木)
烧地	阳历三月	划定防火线,以灰烬作为肥料(森林防火,天然肥的使用)
播种	阳历五月	根据鸟叫声、花开判定时节(人与自然的互动)
薅草	阳历六月至九月	抑制杂草无序生长,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割谷	阳历十月	祭祀氏族神灵,先割谷魂、水魂所在地(“万物有灵”)
脱粒		先由男子赤足揉搓谷穗,再由妇女用弯木棍反复敲打清理
装仓		为预防火灾烧毁粮食,仓库分散在村边,如图1(防火意识)

注:资料来源于颜思久的《布朗族农村公社和氏族公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8至53页。

据表1可知,布朗族在整套旱稻耕作过程之中遵循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其一,选地;阳历一月份,在西双版纳亚热带山区,天气微寒,农事相对清闲的季节,也是选择耕地的时期,一般所选耕地是抛荒多年的旧地。^{[6]49}其二,砍树;多在二月份进行,小树、老树并不在砍伐的范围之内,据章朗村管护员岩章往所说,在动工砍树之前,会在所砍树的片区用糯米饭、蜡条、点心等向神灵祷告说明砍树的用途,以防上有神灵责怪。其三,烧地;阳历三月,亚热带地区高温干旱,枯枝落叶较多,是较为理想的放火烧山时节。但此处的烧山活动实为防止发生森林火灾,如大家先到地里捡集树枝和杂草,破出数道防火线,在地边准备好竹筒水。其四,播种;阳历五月时,雨季来临,布朗族判定播种时节一般以自然界万物作为其标准,当听到深山中的一种鸟儿发出“班好塞火,班好塞火”的叫声,又见麻粟花开成一片灰白色,全寨人便知播种时节到了。^{[6]50}其五,薅草;六月至九月期间,正是亚热带山区植物生长繁茂时节,旱地上的杂草也以旺盛的生长力与禾苗竞争生存空间。其六,割谷;阳历十月间

收割,需要祭拜神灵,反映了布朗族对于神灵、祖先的崇拜、尊敬之意。其七,脱粒;完全依赖于男女手工劳动。其八,装仓;为预防自然和人为火灾,布朗族仓库一般建在村边特定地点,每个仓库^①约占地四五平方米,为主楼建筑,由竹子架空,上面放置粮食^{[6]51}(见图2)。



注:图片来源于笔者2016年7月19日在勐海县章朗村调研中拍摄。

图2 章朗村布朗族所建仓库

^①章朗村村寨的仓库不同于其他布朗族地区,其仓库下面放置棺木,上面放置粮食,据当地村民所讲,下面所挂棺木是死在村外无法进入坟山的人。

布朗族在与自然的不断接触之中,往往将人与自然混为一谈,将动植物作为与人一样拥有生命、思想和灵魂的存在,抑或是一种比人更为高尚的神灵依附体,也进一步说明了布朗族适应自然生存的一种共生模式。采集主要发生在春、秋,狩猎虽一年四季皆可,但多在秋后进行,采集狩猎的时节较好地规避了动植物生息繁衍时期。农耕作业的整套流程包含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休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土壤肥力,焚烧杂草则为农作物提供了天然肥料。

(二) 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

环境保护的制度化主要是约束、限制人们的不合理行为,将环境问题纳入社会规范之中。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所谓的“森林法”,而是通过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习惯法、祭祀礼仪等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森林乱砍滥伐、森林防火、保护动物。在布朗族的信仰中,原始崇拜与宗教信仰是共融的,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建立在人们的信仰之下,这种信仰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可能有共通之处,但也因生存地域环境不同而有自己的独特性。

1. 传统环境保护法规:乡规民约

几千年来,章朗村附近植被茂密,归根于章朗村的森林保护规范及乡规民约、习惯法。章朗村周围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其中位于村寨周边的坟山是村民祖祖辈辈死后的安葬之地,也是全村禁忌之地,不能随便进入,坟山中的树木禁止砍伐和采摘,即使是枯枝落叶也不能捡,狩猎更是被禁止。每逢祭祀或过年、过节,族人去缅寺举行滴水仪式来祭拜祖先。村寨对于坟山的保护,利用人们对逝者的敬畏心理,来约束其行为,完整地保护了坟山的森林生态资源。

2. 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祭祀礼仪

为防止村民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布朗族有砍伐树木前要先祭祀树上神灵一说。森林是布朗人所敬畏与崇拜的“鬼神”的住所,每一棵树上都依附着一个生灵。布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处处有

鬼神,自然界中的一切,包括森林竹石、河流山川、日月星辰、生老病死等皆有鬼神主宰,皆按鬼神意志在运行,包括天神、地神、水神、火神等,并没有谁高谁低,而在于所管辖事物不同。据章朗村缅寺的佛爷所讲:树木不能随意砍伐,如果所砍的树上有神灵居住,那神灵便会降祸于砍树之人。村寨中曾有一户人家,旁边有棵大树的枝干遮住了他家中的房子,于是,这家的男主人便将树枝砍断,没过多久,他便生病了。然而奇怪的是,他到处求医,竟无人能诊断出他的病因。这位男主人认为是自己砍断树枝冒犯了树上居住的神灵,于是到缅寺找到佛爷,请求佛爷念经,没过几天他的病便好了。森林乃至一些年龄久远的树木是神灵的栖居之所,一旦要砍伐树木,布朗人便会带着一些祭祀品包括蜡条、茶叶、饭、米、点心等献祭,向树上居住的神灵祷告,说明砍伐树木的原因,并请求神灵谅解。

(三) 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

布朗族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体现于原始崇拜、宗教信仰之中,“万物有灵”论贯穿于布朗族的思想意识之中,认为鬼神无处不在。布朗族从人的灵魂观念出发,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都同人一样是具有感情、灵魂的生物,而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又可以将其感情施加于人。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在村落中一代代族人为适应生态环境发展不断传承和延伸。

从原始崇拜来看,章朗村布朗族有其独特的植物崇拜,如神树,即榕树、三叶蔓荆,祭祀“神树”的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带着蜡条、糯米饭、点心等向“神树”祈祷庄稼丰收、人畜平安等。因章朗村布朗族信仰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中“榕树”和“菩提树”的概念类同,章朗村所祭拜的“神树”即“榕树”;三叶蔓荆栽培在寨心和祭祀场,也是祭拜的“神树”。经调查,章朗村的民间信仰及佛教信仰的植物有103种,如芭蕉、鸡蛋果、榕树、蔓荆、文殊兰、砂仁、杉木、菩提树、石楠等等。^①从宗教信仰来看,全村布朗族皆信仰南传佛教。全村男子在满13岁之后便可送

^①参考云南省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2016年5月4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7-8页。

入寺中做小和尚,短则一星期,长则终身,这种规定在东南亚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中普遍存在,做和尚时间长短有异。在严格的宗教信仰之下,僧人、信众对于自然持“平等观”“众生观”,只有共生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章朗村布朗族的信仰观念约束了人们的乱砍滥伐以及过度掠夺行为,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

章朗村作为一个千年古寨,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布朗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世代承袭的“布朗王子”“龙坝头”,乃至缅寺与村寨的“佛爷”和“阿章”,即“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共生,在村寨文化架构的管理模式之下,布朗族的传统才得以延续。布朗族的传统文化蕴含于生产生活、乡规民约、祭祀礼仪、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危机与应对:布朗族生态文化的转型^①

布朗族生态文化在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又有传统与现代的交叉共融;既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类似,但又异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表现在从采集狩猎与农耕社会结合向工业化社会转化、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化、从异质化向同质化转型。这一局面的打破对于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既是一种危机,又是一种挑战。章朗村布朗族在面临社会转型的同时,因利益诉求、外部诱惑、市场刺激等因素,各种驱动机制的影响,带来诸多矛盾与冲突,亟待寻求更好的方式,在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能实现布朗族生态文化的创新。

(一) 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章朗村布朗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主要体现在生产技术革新及观念的转型,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对于土

地和资源的需求剧增,传统的生计方式难以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当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现代技术逐渐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如茶叶生产的商业化。

长久以来,章朗村的农耕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轮歇抛荒”,农作物以旱稻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章朗村人口开始逐渐增加,耕地渐趋紧张,传统的轮作制度、采集狩猎已难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据当地天然林的管护员坎动所讲:“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那时我十来岁,经常和孩子们去森林玩,很多的拖拉机从森林进进出出,大棵大棵的树被拉到寨子里用来建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更多的森林植被被开辟为农田,或被用于建筑房屋,过度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这一时期的森林破坏极为严重,导致森林覆盖面积普遍降低。天然林的两位管护员岩章往、坎动看到现今稀疏的森林仍旧在感叹:“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人们砍的啊,那个时候的森林比现在茂密得多!”20世纪90年代,章朗村村民由于生活艰难,大批的年轻人只好外出至我国其他地区,或者泰国、缅甸打工谋生,这样,人口的骤然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生态系统得到短暂修复。

进入21世纪以来,茶叶进入商品市场,并为章朗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一些外出务工的人口开始回流。茶叶市场的开辟,使当地生计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茶叶种植取代了原本的旱稻、玉米、甘蔗。一方面,在人口回流的刺激之下,新一轮的人口激增使得一些山地被用于建造房屋,如章朗村中寨则是人口激增、土地资源紧缺之下新建的寨子;另一方面,茶叶市场的巨大利益使得村民无限制地种植茶叶,甚至不惜违反法律在天然林、水源林、风景林中种植茶叶。笔者跟随章朗村天然林保护小组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天然林进行巡护时,发现一些非经

^①国内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二者是交叉连续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双重性,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向异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亦有传统向传统、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参阅李德、郝秋华的《断裂与弥合:社会转型理论及对当前社会发展的反思》,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第81-85页。

济林中,分布着大片的茶树苗,有些茶树周围的植被已被砍掉。据管护员坎动所讲:“一棵茶树苗5角钱,现在人们都有钱了,不在乎这点钱,知道这么做会罚钱,而且也知道被我们发现会全部拔掉,还是照样做。”护林员、管护员都称:“这种事情太多了,上报过,但也没有多少效果,苦的是我们,想尽自己责任杜绝这种情况,但又是乡里乡亲开不了口。”人与茶之间出现的矛盾并非一种单一现象,其涉及的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村民、护林员两个行为主体,但此种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以及乡规民约的限制之下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章朗村人认为:“保护好章朗村的森林光是林业部门依据《森林法》管理是不够的,还需要村民的传统信仰、组织和仪式协同作用。”

章朗村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在人口增加、利益诉求、市场刺激之下,要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计方式从采集狩猎—农耕向茶叶种植转变,二是制度层面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人口与资源冲突、地方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生计方式的转变需要适应当地生存环境,制度层面的转变需要将国家法律与地方乡规民约结合起来。因此,章朗村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需要在部分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新的现代化元素,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章朗村布朗族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存在交叉与共融,主要表现在文化共存、技术传承与创新上。从空间层面来看,布朗族生态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如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寨门”由木制变为石制便是最好的体现,水泥路、太阳能路灯、公共垃圾池、公共厕所等,最为显著的是金碧辉煌的别墅式建筑,这些都是现代化的标志;而寨门旁的神树、路旁静寂的坟山、山涧的泉水、位于最高处的缅寺建筑等处处处透露着传统信仰以及自然的气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在继承传统的生态文化基础之上,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转变当地非科学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等,建立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现代化生态文化发展模式。章朗村布朗族生态茶园正是采用传统和现代技术相融合的管理模

式,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共生。

章朗村茶园的管理模式正好印证了布朗族传统管理和现代技术的结合。茶叶在布朗族的生产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茶树一般是种植在森林之中,更多的种植在集体林,在水源林、风景林之中也有少部分茶树分布,茶林共生是其生态茶园建设的成功模式。随着现代文化的传播,章朗村的茶园管理受到了较大冲击,主流文化渗透、环境变化、劳动力、土地经营方式、地方政策等,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布朗族对自然的尊敬和崇拜大大消减,原本一些有利于古茶园生态平衡和资源保护的民族习俗、禁忌和耕作文化等逐步淡化和消失。^[8]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布朗族大面积砍伐树苗,以种植茶树。同时,茶园也正面临着危机,如毁林扩大台地茶园、局部改造“中低产茶园”以及过度采摘古茶树等。

因此,在应对茶园所面临的危机时,既需要继承传统的茶园管理模式,也需要融入现代化科学技术,维持茶园生态平衡。基于对布朗族村寨的古茶园实地调查发现,古茶园在长期的人为传统的管理模式之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类型,大部分古茶园成片存在于次生林中,少数单株分布在村寨周围的田地中。次生林中的古茶园形成了具有上、中、下三层的复合结构模式,其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天然林类似,群落结构大致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古茶园的上层主要生长着椿树、榕树、樟树等高大乔木,中层主要是古茶树、兰科、豆科等植物,下层为蕨类、药材、野生蔬菜、姜科等。与天然林不同的是,古茶园的中层是以古茶树为优势,古茶树盖度极高,可带来长期、持久的茶叶经济效益,并提供木材、药材、野生水果、野生蔬菜等采集经济。在村寨附近的古茶园,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农户在古茶园中从事农业生产,在古茶树下种植旱谷、玉米、豆类、杂粮等农作物和蔬菜,形成具有茶叶经济和作物经济的复合型生态系统,主要由古茶树和农作物构成,茶园地表层由于种植农作物常被翻耕、施肥、除草,使得茶园中几乎没有其他杂木,草本层除农作物外,其他植物杂草被挤到地角、田边。^[9]生态茶园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也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章朗村的森林茶园农林生态体系成为山地农业中的一个典型的示范模式。古茶树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布朗族的社会变迁,影响到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种茶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意识是布朗族适应其生存环境需要而产生的,不仅对于保护当地的生态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保障了章朗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综上,章朗村布朗族生态文化在面对传统与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既有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又有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转型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传统被现代一味地取代。传统与现代碰撞下,进一步激发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冲淡了原本的信仰观念,现代化的进入仅是传统文化破碎的突破口。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矛盾,需要融入现代化元素,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生存环境,寻求适合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四、结语

布朗族生态文化建基于传统之上,又在现代化过程中持续发展,但在转型之中,由于人口与资源、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冲突,传统与现代并非单一链条,而是处于一种循环模式,传统与现代需要融合。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生态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并非是一种消融,而是走向更为贴近现实、符合未来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道路。由于田野调查点仅限于章朗村,对于不同生存空间之下同一民族的生态文化的差异尚未进行有效探讨,此方面也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中所欠缺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入。少数民族村寨社

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不同,中国社会从同质化向异质化转变,但少数民族社会却在受到现代化元素冲击下,从异质化向同质化转变,即趋同化。这种现象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危机和挑战,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所在,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久发展。依照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来看,单一化、趋同化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的发展走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全球化发展中寻求多元共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穆文春. 布朗族文化大观[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 [2]穆文春. 布朗族的森林观与森林农耕方式[J]. 生态经济, 2003(11): 18-21.
- [3]杨竹芬, 苏红斌. 布朗族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探析: 以临沧市邦协村为例[J]. 黑河学刊, 2013(1): 180-182.
- [4]安静. 布朗族民间信仰的功能研究: 以西双版纳老曼峨村为例[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 [5]廖国强. 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 28(4): 43-49.
- [6]颜思久. 布朗族农村公社和氏族公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7]陶玉明. 中国布朗族[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30.
- [8]方双龙, 杨兴洪. 西南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与风险特征分析[J]. 广东农业科学, 2010(6): 292-296.
- [9]蒋会兵, 梁名志, 何青元, 等. 西双版纳布朗族古茶园传统知识调查[J]. 西南农业学报, 2011, 24(2): 813-818.

